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

三 评

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可概括为三个阶段:1983年至1985年为酝酿准备阶段;1986年至1989年为以宏观研究为主、侧重理论与方法探讨的第二阶段;1990年至今为微观研究兴起、中国社会文化史全面发展开始走向成熟的第三阶段。在列举了理论与方法、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大量成果的基础上,作者指出,目前虽然成果甚丰,但主要依赖于社会学的学科特质与研究人员的个体努力自发运作,缺乏明确的研究目标和周密的整体规划,空白与重复研究的现象难以消除,要达到课题选择的相互协调、研究力量的合理配置以求通过优势互补实现最佳效益,必须尽快地发展具有社会学主体特征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综合的宏观探讨。

作者:王頔,男,194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学研究所副编审。

面对世界、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面对中国的历史,是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与发展的主要特征。研究队伍的集结、理论体系的构建、实证调查研究的拓展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无一不与这“三个面对”息息相关。

面对历史正是为了面对中国的今天与明天,也是为了中国社会学以完备的理论体系及其对社会的进步予以科学的指导屹立于社会科学的学科之林。近年来社会学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内容十分庞杂,上自华夏民族结成下至改革开放起步其间数千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次第演进,哲学、法律、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宗教、民俗乃至战争、灾害、衣食住行,研究所向几乎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要在一篇文章中对如此纷繁的内容予以概括其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社会学以其鲜明的学科特征区别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诸学科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如果从学科的特质出发或许能使我们寻觅到近年来社会学在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发展的脉络。

以“社会文化史”来涵括社会学研究的所有历史问题不一定准确,笔者愿就这一问题与社会学界同仁共同探讨。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轫及其发展阶段的划分

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它是在改革开放数年之后经济基础的变革向上层建筑领域迅速延伸、中西方文化交汇导致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由器物层向思想文化领域急剧扩张之后起步的;是在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恢复重建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之后进一步发展的。因此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比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及社会学组

织机构的建立、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初步展开等自身的整体建设晚了一个阶段。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十年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9年—1982年为建立机构集结队伍、确立研究方向、开始重大课题研究的第一阶段；1983年—1985年，一些重大课题初见成果，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社会学研究课题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六五”规划，这是社会学进入常态发展轨道的第二阶段；1985年之后为社会学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起步于社会学恢复重建发展的第二阶段，兴旺于社会学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中间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曲折与调整，1989年之后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

社会学向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是以下述几个方面为背景的。

首先，社会学的自我完善需要不断拓宽研究视野。刚刚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在理论体系上的薄弱与大量实证研究课题的亟待深化是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动因。1983年之前，社会学领域完成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成果，诸如小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犯罪问题、婚姻家庭问题等，已取得的成果面临着深化研究的问题，当时的社会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操作方法上都很难胜任更高层次的需求，加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已迫在眉睫。

其次，急剧的社会变迁向社会学提出了挑战。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以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社会学面对着由发轫于农村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的变迁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大变革，面对着十年动乱以及建国30年中极左路线横行遗留下的大量社会问题，势单力薄的社会学不仅无力承担起各门学科的主干协调任务，而且已有的主要课题都需要大量的外援多方协作来完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改革的步伐加快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革，向原有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提出了挑战，急剧的结构社会变迁对刚刚重建的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社会学迅速成熟起来。

再次，中西方文化交汇引致的社会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在短暂的几年内迅速地由器物层向深层次内核延伸，局限在浅层文化范围之内已经难以引导冲突的发展，甚至连解释这种冲突都缺乏力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开始向着多样化个性化发展，如果把人们衣着、发型的时髦及迪斯科舞、通俗歌曲的流行等当作本土文化的浅层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后所产生的一种非主流现象看待的话，它所蕴含的本质是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对个性解放的崇尚。然而当时的主流文化却利用自己的优势甚至不惜采用行政手段企图在浅层文化范围内压制这种非主流文化，一位歌手在舞台上扭动几下腰身便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在牛仔裤、通俗歌曲遍及全国的今天回忆起来真让人啼笑皆非，然而当时不少单位的领导干部确实在每天早上都站在机关门口一丝不苟地检查人们的着装与发型。一个封闭多年的社会即使在经济改革起步之后对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容忍度依然如此狭小。实质上这是传统的社会主流文化与动荡的非主流文化的冲突，尽管传统的主流文化占据着优势地位，然而却难以在文化浅层维持自身的绝对优势。相反，人们对浅层非主流文化的逐步认同却要导致对主流文化的浸润。以往人们无条件接受的主流文化的存在价值与作用之一在于对非主流文化的控制与导向，在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这种单向作用为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所代替，至少在事实上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控制与导向作用在不断削弱。当低层次文化冲突难以平息的时候，这种冲突必然要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人们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以金钱和个人价值的追求为目标，继而升华到社会深层文化中诸如道德、伦理、价值观、人生观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冲突。

1983年前后中国的文化冲突由器物层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这是经济基础

变革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变迁导致的必然结果。1979年4月16日至5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行10人的学术代表团，应美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破天荒地访问了美国。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向全世界敞开大门的开始，这次访问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访问本身的价值。1979年至1983年在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出现了西方文化热，诸如西方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塞拉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代表人物的著作成为人们阅读和研究的热门。而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等为代表的集经济学、社会学、未来学于一体的现代化思想，几乎成为当时人们的必读书籍。

究竟如何看待这股西方文化热潮？为什么这股热潮在兴起不久之后便消退了？以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化热的消退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笔者认为，西方文化热的出现是在封闭禁锢多年之后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必然发生的现象，正是由于我们的长期封闭才导致了一场西方文化热，将原本可以在长时期内缓慢推进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变得短促急剧起来。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也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结果，它当然也存在精华与糟粕。这场文化热潮的消退在实际上也不是谁战胜谁的结果，而是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方式奠定了我国新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温床与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正是建筑在包括中西方文化之精华在内的全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基础之上的先进思想。

西方文化热的出现结果导致了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讨论。

社会学学科的自身建设与完善、中国社会改革的实际需要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汇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对中国社会学向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发出了迫切的呼唤，而1985年社会学已完成了恢复重建阶段的任务，走向了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主客观条件的具备促进了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

笔者将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3年—1985年，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酝酿准备阶段。

第二阶段：1986年—1989年，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宏观研究，探讨剖析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论与方法。由于某些同志对社会学的误解与无知，竟置邓小平同志亲自号召“赶快补课”和党中央决定恢复重建社会学的事实于不顾，将人们普遍认同的“保守学科”当作所谓的“敏感学科”，停止了一些大学的社会学系招生工作。这种不公平的冷遇对社会学工作者的情绪及研究工作带来了短时间的消极影响。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宏观研究与理论探讨似乎就此罢手，许多人转而从事微观研究。

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疇向微观研究发展，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标志着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正在走向成熟，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队伍更加成熟。

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结构及其发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社会学在中国中断27年之久，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既要“善事”又要“利器”，理论上的薄弱既是社会学整体发展的特点之一，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整个发展过程看，在刚刚介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初期，受到学科自身幼稚不完善的

影响及研究人员自身知识结构的制约,一方面社会学理论主体框架正在建立,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人员的三分之一来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及自然科学等研究部门,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一些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学科特质体现不多,社会学也无从承担各个学科在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骨干。但是,起步较迟又是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一个优势,社会学在对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的实证调查研究中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同时又可以用整体的综合的特殊的视角对西方文化热、中西方文化冲突及中国文化大讨论等已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予以科学的冷静的分析。

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学从一开始关注中国社会文化史便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出现了大量社会学学科特质不十分明显的文章,文章十分鲜明地受到作者转入社会学之前原有知识结构的制约;二是许多文章明显地带有“善事”和“利器”的双重性质,甚至有的名曰“善事”却以“利器”为主,并不是作者写跑了题,恰恰是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离不开较为完备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使然。

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社会学界运用的理论之核心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二者的割裂、拼接与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社会学学科特征逐渐强化的过程。

如果按照中国特色的分析方法,将以往“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思想,分解为“毛泽东的想思”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共同创造的“毛泽东思想”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分解为“马克思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些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同志正是要回到“马克思的主义”去。我们看到,无论是“马克思的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都是十分完备的。因此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大量论文中单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探讨的文章在社会学界并不多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诸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出发点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说,等等,几乎无一遗漏地被用来作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基本指导思想。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探讨的不多,所以我们只能从文章分析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作用。

在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时,许多同志依据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的五阶段论,以中国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亦即资本主义文化的缺环,将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及基本成份。

董崇山提出了“与传统文化主体诀别”,其主要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现代与传统”的二分法。董崇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形态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我们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内涵,是指传统文化框架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或者说是传统文化框架的主体,是指传统文化最主要最根本的哲学观点、理论观点、政治观点、思想观点和伦理观点。”“封建主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部分、核心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封建主义、宗法主义和专制主义,封建思想、宗法思想和专制思想三者密切结合在一起,三位一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专制主义思想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是经济专制主义、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密切结合在一起。”^①

^① 董崇山:《同传统文化主体诀别》,《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

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学说分析中国的社会观念特征，潘照东认为，“中华民族的社会观念，是在以封建宗法制维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不少狭隘、落后甚至荒谬的成份。”“这些落后的意识不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阻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发达，而且是导致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乃至方针、政策上出现重大偏差的重要思想根源。”“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传统社会观念表现为保守性、封闭性、狭隘性、愚昧性、专制性以及轻利贱商的农本思想、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专制主义的宗法思想”，“精神胜利法”，“自卑自贱的奴隶主义”等。^①

在研究中国的新文化建设问题时，从理论上难以跨越的障碍之一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之比较，依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比资本主义文化高出一个阶段，因此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初期人们一般在理论上是回避这一问题的，采用的观点大部以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说中资本主义文化对于封建文化的递进关系，以此来面对改革开放的实际。人们不缺少对封建文化毫不留情的批判勇气，却又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被自己割裂的甚至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内。董崇山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地吸收封建主义文化，另一方面要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文化。而且两者相比，后者更重要，后者是重点。两者相比，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文化，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正像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主体都应该坚决否定一样，资本主义文化的主体思想当然也应该坚决否定。但是，与封建主义文化相比，显然我们应当从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过程中汲取更多的营养，甚至是多得多的营养。我们从这个较高历史阶段的文化中比那个较低历史阶段的文化中汲取更多的东西，这不正是顺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吗！”^②

理论上十分薄弱的中国社会学被迫中断了27年之久，所谓的“资产阶级出身”又使其在发展中格外小心翼翼，尽管一段时间内免不了削足适履，在理论上羞羞答答，但是在认识社会文化的具体观点上却不乏大量颇有见地的闪光思想。然而长此以往是很难摆脱畏首畏尾的窘境的，社会学要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所作为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于是出现了从运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却又回避某些矛盾的状况发展到寻找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化思想的共同点的过渡性现象。“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观点正是这种过渡性现象的形象语言。

陈烽在《社会形态的两重划分与我国当前社会变革的实质》一文中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该文指出“我国原有的社会发展基本理论体系却无力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指在理论上明晰地说明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它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中，在它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基本适应、只需完善的论断中，无法找到我国当前进行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更无法得出人们日益感受到的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第二次革命’的判断。因为革命意味着质变，而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场变革中并不发生质变。”“挑战是严峻的。唯一的出路是重新理解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基本理论。所谓重新理解，就是彻底审视我国原有的社会发展基本理论体系是否符合和完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也就是‘回到马克思’；所谓继续发展，就是严格按照当今世界和我国社会发展的事实，对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进行检验、修

① 潘照东：《论改革、现代化与社会观念的变革》，《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

② 董崇山：《同传统文化主体诀别》，《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

正、补充和发展,也就是‘超越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吸收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是完全必要的。”^①陈文引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作者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划分三大社会形态的方法显然不同于他划分五种社会形态的方法,而对前两大社会形态的划分则接近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划分。”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决不是算命先生,他们的理论思想也是植根发展于他们所生存的时代及社会,不可避免地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我们决不否认他们的理论思想在人类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是说,历史的发展决不是简单的刻板的轮回运作,因而在当今时代我们所遇到的大量的新的问题,并非都能够以“回到马克思”用“马克思主义”来剖析、解释进而予以解决的。这正是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的挑战,也是社会学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契机。

早在改革之初,与西方文化热同时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亦发生了重大影响,不同的是这种影响是发生在热潮退却之后,人们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给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高速发展的新的世界格局感到失落的中国人带来了多大的喜悦——工业时代由全新的信息时代所代替,这新的文明的浪潮将席卷全球,从而使处于各种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可以站到同一起飞线上,处在第一次文明阶段农业化阶段的国家可以越过第二次浪潮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第三种文明即信息社会。托夫勒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企业界及政府部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份对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读过《第三次浪潮》的占被调查总数的78.6%。奈斯比特关于美国社会出现的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国家经济转向世界经济等十大趋势的观点也使许多中国人感到耳目一新。

对于西方文化热的反思以及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导致了社会学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中,具有鲜明的社会学特质的理论的升华。

冯钢指出,将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以传统阶段和现代阶段相区别,“这种‘传统—现代’两分法的标准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是‘现代社会’,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是‘传统社会’。”“首先,以西方社会文化为标准的‘传统—现代’两分法,制造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形而上学的对立……第二,把各种‘同时性’文化作‘历时性’转换,否定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发展……第三,以西方为中心的‘趋同论’,阻碍了世界文化创新性发展。”在分析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时作者指出,“人们通常都把西方的‘过去’看成是‘新的’、‘先进的’,而把中国自己的‘过去’看成是‘旧的’‘落后的’……于是这种‘新的’‘过去’便成了我们‘现在’的主宰。这种观点虽然反对按中国的‘过去’来设计‘现在’,但却津津乐道地用西方的‘过去’来裁夺‘现在’。我们的今

^① 陈烽:《社会形态的两重划分与我国当前社会变革的实质》,《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3期。

天就是西方的昨天，而西方的今天则是我们的‘明天’。”“社会文化发展，并非是去判别哪个‘过去’是新的，哪个是旧的，并从中进行选择。对于现实的今天来说，一切‘过去’都是旧的。发展是从‘现在’出发，走向‘未来’。一切‘过去’都必须服从于‘现在’的现实。”

“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一种同全世界共同占有‘现在’的‘世界眼光’来作为我们鉴别一切‘过去’的标准。……用这种观点（指‘还原论’）来理解现实世界在空间上的联系，便会把世界仅仅看成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国家或地区构成的总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之间虽有影响，但大致上都是沿着相似的‘自然历史’途径发展。……它掩盖了一个现实的，由整体世界各个部分同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结构空间，从而把我们的视野仅仅限制在彼此分割的世界各个部分之中，看不到整个世界结构给我们的发展带来的利弊因素。用这种观点来看各国发展间的联系，往往会使我们把探索发展之路的希望局限在效仿‘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上。而事实上这些‘历史’经验多半是藉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成功的。同样的历史却不可能再为我们重演。”“就文化发展问题来看，虽然‘两种文化’的冲突向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同样也应是对西方文化）提出了发展的要求。但是，应该如何发展，这个问题却不是由哪一种文化所能解释的，而是需要从各自的现实处境和未来要求中得到解释。因此，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整体地把握世界格局以及在其中所处的‘位置’，遂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发展前提。”^①

西方文化热尤其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传播为我们拓宽了视野，当然自发的各种文化热免不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是退一步来讲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生长的参照系，把西方思想看作洪水猛兽首先是我们自己丧失了信心。就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文化史，没有理论的导引，是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我们的理论框架恰恰是来自于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它诸如未来学等理论思想，此外极其重要的是社会学理论，加之我国的优良的文化传统，诸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彼此割裂地拼凑在一起。

从董天佳的《阶级与生存体系》^②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界在理论研究上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作者将“生存体系”界定为：“特定民族、特定地区、特定时期人们生产生活各要素互相配合、有机联系构成的任何一个独立发展的民族都具有的自成体系的生产方式的结构，是人与以生产力水平为标志的社会存在结合的具体形态，一方面反映人的特定需求，一方面反映满足或制约这需求的特定的社会存在。”作者认为生存体系具有三方面特征：①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在具体作用于各阶级时都有其具体形态。在各时期特别是在各民族各地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五颜六色，决不是同一模式，没有抽象的生产力，更没有抽象的生产关系。如，原始生产力可以有采摘、狩猎、收获、捕鱼等多种具体形态；奴隶制下可以有罗马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生产力，也可以有游牧的或是农耕的；封建的生产力有庄园自给自足的，有小农个体独立生产的，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差别；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也应该具有多种具体形态。②生存体系的作用不是单因单果的线型作用，满足着规定着人们生存发展特定需求的客观因素是有机多面体存在，象人的五官一样不可分割，其作用乃是各因素的整体效应，多维立体地作用于各阶级，不存

① 冯钢：《世界文化的“危机”与发展》，《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董天佳：《阶级与生存体系》，《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4期。

在机械性的相互作用、谁决定谁的问题。③生存体系是人群生存发展的直接条件，直接明确地规定了各阶级生存发展的特定需要，各阶级直接依此为生，在这样的生产、这样的生活中产生具体利益要求，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家庭关系和家庭活动等都在这体系中，受其规定，阶级利益由此具体化，阶级的社会行为由此固定化。在阶级社会里不同地区的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对各地区、民族的社会面貌及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一切无不出于特定的生存体系，特定生存体系规定了他们的利益要求和社会行为，导引他们以不同的速度向不同方向将自己所在的社会向前推进。

笔者认为，生存体系论是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试图探求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具有的阶级本质及阶级本质之外的其他性质及特点。尤其是对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宏观环境的研究使我们从传统的单纯的阶级抽象向前跨进了一步。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作为社会与自然的主体“人”与整个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的基本内涵不仅仅表现为阶级，生物人与社会客体的结合点也不仅仅体现在阶级上，只讲固有的阶级本性，整个社会就会被抽象为空洞的阶级本性的空洞骨架。从生存体系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的各个层次进行分析，我们得到的将是具体的、特性各异的、由多种因素制约的和决定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环境。

从“社会结构”研究入手也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理论上正走向成熟。李培林认为，“社会结构就是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对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这三个层面是要素构成形式的层面、规范体系的层面和关系网络的层面。根据这三个理解层面，我们可以划分出实体性社会结构、规范性社会结构和关系性社会结构。”“实体性社会结构、规范性社会结构和关系性社会结构并不是社会结构的三种不同类型，而是理解和认识社会结构的三个不同层面，即现象的层面、功能的层面和本质的层面。”作者依据上述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亦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概括出五个特征：稳定性、封闭性、刚性、整合性和二元一体性。“所谓刚性结构，是指社会结构的应变性和可塑性较差。”“社会结构的整合本来是相对于结构分化而言的，但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整合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民族同化、文化融合和社会一统。”“维护社会关系的有序一般有两种手段，一是外在的法——法律，二是内在的法——伦理。二元一体指的就是法理和伦理的一体化。”“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高度稳定性、封闭性、刚性、整合性和二元一体这五大特征是互为条件、互为补充的。解释这些结构特征应当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把经济结构看作社会结构的基础层次，注意从经济上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二是把社会结构看作整体文化的积淀物，努力从多种维度探索社会结构特征形成的条件，而不是把经济当作解释的唯一维度。”①

盛少波认为，社会学的特征就是从“人的活动”出发剖析社会。“人的活动”作为个人和社会的创造者，个人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体现者，个人特征和社会特征的反映者，是将社会和个人两者统一起来的“共同实体”，是使两者同时得到表现的“社会现实”。因此，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的研究，是对社会实体或是对社会关系的研究，都必须研究“人的活动”。在以“人的活动”为视角的一系列研究中体现了活动的主体与客体、活动的心理与环境，这一构成社会现实的四极所形成的四大层面，四大层面产生的四大力量对人的

① 李培林：《关于社会结构的问题——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1期。

活动的制约,即从个人心理层面中产生了人的基本需要;从社会心理层面中产生了价值取向;从社会环境层面中产生了社会规范;从个人环境中产生的是情境约束条件。基本需要为人的活动提供了原动力;价值取向引导着活动的方向;社会规范作为活动的规则控制着人的活动;情境条件限定了活动的可能范围。^①

从上述“生存体系论”、“社会结构论”、“人的活动论”以及大量其他的理论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批判地吸收了大量先进的西方社会学基础理论,同时又可隐约寻觅到西方哲学、未来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现代化理论的影子,然而这些理论思想又决不是杂乱拼凑在一起,而是水乳交融升华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拓展,以及社会学理论不断发展及其在众多学科中协调骨干地位的日益确立,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一定会日益丰富趋于完善。

三、社会文化史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自1986年始至1992年底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发展的第二、第三阶段,1986年至1989年受文化讨论热潮影响及自身理论薄弱的限制,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宏观研究在总体数量中占有优势。1989年之后,由于关于社会学是“敏感学科”传言的影响,微观研究逐渐增多以致占据了主流地位。这种现象颇有一点“无心插柳柳成行”的味道。然而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如果要继续发展下去,宏观研究还是必不可少的。从总的趋势看,在这7年当中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有这样一些特点,即从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发展,宏观研究由结构浅层向功能深层研究发展,微观研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拓展,精英文化研究向世俗文化研究延伸,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研究范围已经包罗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各个方面。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探讨 这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由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这个观点极易趋同而且很难不断突破的课题出现了百花齐放次第深化的现象。主要观点有:

1. 中国封建社会所以长期延续,一是由于封建主义、宗法主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二是由于政治专制主义、经济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三位一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最基本的东西、最主要的东西概源于这两个“三位一体”。^②

2. 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二千多年之久,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极端专制主义与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温和”专制主义合流,使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具有极端的残酷性与极强的自我调节功能。^③

3. 由于中国幅员的辽阔、地理条件的复杂多样,集约农牧业的推进颇为艰难。中国农业地带之广袤、农业人口数量之多、空间地域推迹所消耗时间之长,是古代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及的。自周秦以来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力没有根本变化,基本的农作物和家畜、家禽一直延续到现在,以小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男耕女织的家庭农业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多大变化,甚至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多大提高。与这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一致的家国一体的封建宗法制度也始终没有根本的质的变化。唯一显著的社会运行

^① 盛少波:《从马克思走向社会学的统一》,《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董崇山:《同传统文化主体识别》,《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

^③ 王頔、唐军:《孔子与韩非思想的社会功能审视》,《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1期。

律，是周期性的经济政治危机，体现为治一乱的循环和王朝的更替。

4. 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庞大，组织和控制力之强，是世界其他封建专制帝国难以企及的，而需要并导致建立那样一串相互衔接的封建王朝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正是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分散、弱小的小农经济无法兴修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工程，也无法抗拒游牧民族的侵略。它需要政府的权威来组织水利工程的实施、防卫和其他社会管理。

5. 封建社会内在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周期性的循环运行轨迹，同时还伴随着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斗争与融合的周期性反复过程。两种周期性的社会运行过程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叠加现象。这种叠加的周期比单纯的内周期或单纯的外周期在时间上拉得更长，波幅也更大。

6. 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包括王室争夺王位的斗争、朝廷与藩镇等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斗争以及军阀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游牧民族的入侵、农民起义和对农民起义的镇压相交混，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重重叠加，使社会经济、文化遭到极为深重的破坏而同时又在畸形发展。

7. 中国封建社会运行过程中，不仅各种内外社会矛盾重重，同时自然灾害也呈周期性规律出现。李约瑟据中国史书记载统计，在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发生1600次大水灾，1200多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新文化建设的探讨 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相适应的全新文化，在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如何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观点有：

1.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世俗化特点，人伦意识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种人伦中心主义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向朴素的“人文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两个方向延伸，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双重结构。在这样一种双重性的文化结构中，人文主义与专制主义、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个人主义与群体至上主义互相牵制、互相渗透，形成了它特有的稳定性。这样，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作为前资本主义时期与资本主义时期两大阶段中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形态的核心，在中国文化中却通过一种特殊的纽带联系起来，成为同一文化结构中的两个因子。这种双重性的内在结构使对立的双方可以互相制约，任何一方都难以发展到极端；通过对立双方互相补偿，左右逢源，形成强大的弹性和同化能力；人文主义与专制主义同胎共存，故而在整体上缺乏强有力的对立面。由于这种双重结构的文化的自我封闭，过分追求同化而排斥多元，它能够成功地进行一些局部的有限的渗透性的变化，而难以接受那种剧烈的涉及根本的深层的变化。又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发展是通过中心向外扩展，逐渐渗透包融而实现的，因此它缺乏一种以目的为导向的进取价值观，而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以整合价值为首要意向的平衡价值观。^②

2.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农业文化。以世界最大的亚欧大陆为依托，以具有相对“隔绝机制”的地处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东亚为舞台，便形成了历史的连续最长、作为文化的“活载体”的人口最众多的以农民家庭农业为基础和主体的中国传统大陆农业文化。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由氏族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又逐渐演化为奴隶制时代的“家国一体”的国家

① 张琢：《中国封建社会运行的特点及成因》，《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5期。

② 潘建雄：《中国文化的双重性结构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3期。

形态,这种宗法关系延续到封建制、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形成了中国极端尚血统、崇家族、重传统的传统。^①

3. 与上述观点相对立的一种意见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实质上的非整合性。袁阳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整合性的由来已久的看法其实是有悖于文化史实的,由此不能不影响到对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关系的评判。”其根据有三:一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价值反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是以宏济天下为主旨的儒家精英价值目标的高悬,取向为公、义、名,具有明确的理性内涵;一方面是以谋求身家性命为核心的大众价值观念繁衍,指意为私、利、实,具有较重的感性成分。精英价值的推行受到大众价值的消蚀,大众价值的幅射受到精英价值的抑制。这种同一文化系统内部价值反向追求的紧张冲突与内耗,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功能;二是文化结构的多元互损。传统文化各派虽然都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但它们在逻辑上却又是自圆的,具有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特征。任何一派学说的实现都必将以对其他思想的功能损害为前提。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实,并未能凝聚为强大的社会功能,相反却是相互掣肘,降低了主流文化整合人心、推动政治机制的效率;三是民族魂在家庭细胞中的消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凝聚力主要表现为家庭伦理亲情的召唤在人心激起的强烈归属感和依赖感。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没能使归依于各个分散之家的精神汇聚成民族的整体精神。儒家将基于先天的父子兄弟关系与基于后天的君臣上下关系,按同一原则置于同一道德律令下时,逻辑上便存在很大的裂缝。忠君与尽孝并立于伦理核心,无疑是一种伦理的两难设置与分裂。由于儒家文化的内部逻辑断裂,使中国人的精神旅途归于家而终止,未能达于整体的国家民族精神。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目标上多元互损,中国人在精神上便成为一盘散沙。^②

对于新文化建设问题的认识基点是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的评价,评价的核心又是今天的中国的社会文化的结构。

1. 羊涤生认为,中国文化有三个来源:①中国传统文化;②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③西方文化。“今天”中有历史的“昨天”,有历史的年轮。但历史毕竟并不都能成为传统。比如中国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现在也已发生变化,现在已不是什么伦理中心,而是物质利益第一。现在也不是什么重义轻利,而是义利一致,或是见利忘义。这个“义”也已不是孟子所主张的“义”,而是遵纪守法、机会均等、货真价实,是指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义”等等。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地方又如此之大,人口又如此之多,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近代中国文化讨论中,曾经有一个说法,认为中西之分即古今之异。中西之分的确有古今之异,但并非即古今之异。因为既有共性还有个性,或者说既有时代性,也有民族性;既有古今之异,也有中西之分。如果说中西之分即古今之异,稍一引伸就会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③

2. 董崇山认为,地主阶级的阶级性是封建主义文化的根本特性。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上,正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历史性的痛苦选择:或者是,提出儒学现代化、传统文化现代化之类的口号,社会从主体上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是过多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不能摆脱它的桎梏和枷锁,我们的改革就不能取

① 张琢:《中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二重性》,《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袁阳:《中国传统文化的非整合性及其对现代化的社会负功能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6期。

③ 羊涤生:《试论文化的综合与创新》,《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3期。

得成功，我们的四化大业也不能指望早日建成；或者是，提出同传统文化主体诀别的口号，就会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主体，就会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的消极成分，那么，我们就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摆脱它的束缚，我们的改革就会取得成功，我们的四化大业就会早日实现。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根据我国的国情，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因素。第三个因素是核心部分。这三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统一体，再加上我国的民族形式，这或许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①

3. 于真认为，我国社会变迁的症结是社会历史文化特质没有真正改变。社会变迁的过程，从一个社会形态转到另一个社会形态，是全社会文化特质和人的社会本质发生变化的全过程。它的问题远非夺取了政权，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所能完全解决的。当旧的文化特质和历史传统还大量存在的时候，如果新的统治阶级不强化本阶级的经济基础，彻底改造旧的曾经是同它的上层建筑相对立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以及为之服务并与之适应的意识形态，那么，旧文化的惰性将继续长期地发生作用，从而制约社会变迁。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作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现我国社会历史文化特质的真正转变。^②

4. 一些同志认为创造全新的文化是一个与现代化建设同步的发展过程。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社会思想文化永远不会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既是历史的发展，又是中华民族的新的开拓，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必然产生出全新的超越传统的思想文化。他们十分强调的是“超越”，认为全新的思想文化是在超越传统吸收外来精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本土文化是与现代化社会共生并互为依存条件的。因此对传统的东西是要继承的，但是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对旧传统的批判与改造。^③

对社会整体运行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一具体问题的系统研究 这类研究大致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分析：**纵向研究**，例如王日根所著《义田及其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社会功能浅析》，^④着力分析了从宋代兴起，历元、明、清各朝，义田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发展状况及其社会功能；王跃生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宗族的兴盛与衰落》^⑤则是就宗族的兴衰标准、以宗族兴旺为目标的治族方针等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宗族是巩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张允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⑥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妇女的歧视作了较系统的历史考察。**横向研究**，例如晋文的《论“以经治国”对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整合功能》，^⑦论述了“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对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丧葬祭祀、复仇报恩、谦让之风及艺术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全面整合；韩志远在《关于元代社会风尚的几个问题》中，^⑧通过元代“国俗”与“汉俗”即蒙、汉两种文化之争、孝道之演变以及蒙古民族婚姻丧葬习俗对内地的影响，论述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民族间文化冲突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王春瑜在《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⑨中描述了伴随城市的发展明代出现了流氓队伍不断扩大的

① 董崇山：《同传统文化主体诀别》，《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于真：《我国的社会变迁与社会历史文化特质》，《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6期。

③ 王丽、唐军：《孔子与韩非思想的社会功能审视》，《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2期。

④ 载于《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

⑤ 载于《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2期。

⑥ 载于《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

⑦ 载于《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

⑧ 载于《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⑨ 载于《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社会现象。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城市发展了，反而导致了地主阶级政治的流氓化；唐力行的《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①，研究了徽州妇女在明清时代在商业发展中的作用，商业的发展及商人妇的作用一方面使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封建宗族制的强化又进一步加深了对妇女的压迫；张琢在《中国古代家庭规模到底有多大》^②中以充分的论据证明，不少国内外社会学家在论及中国古代家庭的规模时，总以为中国古代一般都是几世同堂、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其实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错觉。中国古代家庭除少数富贵人家是一夫多妻（妾）外，基本形式即占人口和家庭多数的平民百姓的家庭是一夫一妻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小家庭，“五口之家”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基本规模，与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每户4.87人相差并不太远。

四、结 语

目前，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正在形成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第一，具有中国社会学特色的理论框架正在形成。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国现代化思想在社会学主体理论的协调下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形成了社会学的独特视角；第二，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内社会学正日益扮演起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学科的骨干学科，社会学的介入改变了诸学科在以往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专注精英文化的倾向，使传统的注重精英文化的研究渐次让渡于对精英文化与大众世俗文化间交互作用关系的探讨，找寻二者间的作用机制、作用手段及作用效果。改变传统的精英文化研究与大众世俗文化研究的隔绝状况，改变以往注重精英文化研究忽视轻视大众世俗文化研究的状况，将为我们从整体上重新认识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拓宽思路；第三，注重实证研究的学科品格使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了大量卓有见地的微观研究成果，通过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的探索中把握整个社会的运行，使我们找到了社会与人在受制于阶级与阶级斗争规律之外的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环境。因而社会学有能力有可能以独特的视角为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填补若干空白。

笔者认为，目前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赖于社会学的学科特质与研究者的个体努力实现的，而散兵游勇的多方出击也同时带来了研究的空白与低层次重复的不利于在全局和整体上协调发展的现象。社会文化史研究既有密切结合改革开放实际的需要，又有其自我发展与完善的迫切任务，归根结蒂它不是应时应景的摆设。因而要达到研究课题选择相互协调、研究力量的合理配置，通过优势互补实现最佳效益，必须尽快地开展具有社会学主体特征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综合的宏观的探讨。

1992年12月于北京劲松

责任编辑：唐 军

① 载于《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

② 载于《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